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项目

总主编：王巨才

延安文学主编：陈忠实 李继凯



【第二十六册】

延安文艺档案·延安文学

延安作家（二）

李继凯 翟二猛 宋颖慧等 / 编著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第二十六册】

总主编 王巨才

延安文学主编 陈忠实 李继凯

延安文艺档案·延安文学

延安作家（一一）

李继凯 翟二猛 宋颖慧等 / 编著

方冰

传略

方冰(1914—1997),安徽省凤台县人,1914年7月出生。方冰原名张世方,方冰是到延安后在桂林《诗创作》和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作品时所署的笔名,另有笔名李满、林之曲,抗战胜利后在《旅大日报》《旅大文艺》《东北日报》《东北文艺》等报刊发表作品时署用。

1932年,方冰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8年入陕北公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冬,到晋察冀解放区,先后在军区政治部宣传部、西北战地服务团及京西游击区工作,曾任西北战地服务团文学队长。这个时期,曾与田间、邵子南、曼晴、魏巍等积极开展“街头诗运动”,主编油印诗刊《诗建设》,写了大量诗歌,对当时的诗歌运动起到了促进作用,是晋察冀诗派代表人物之一。在晋察冀期间,是方冰诗歌创作最旺盛的时期,由他作词、劫夫谱曲的抗战诗歌《歌唱二小放牛郎》曾到处传唱。

1944年回延安,进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春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反映敌后艰苦斗争生活的长篇叙事诗《柴堡》,后由大连光华书店出版单行本。抗战胜利后,去东北旅大城市等地负责文艺工作。这个时期创作了许多诗歌,后结集为《战斗的乡村》和《飞》两书出版,是抗战时期诗歌救亡运动中涌现的优秀代表。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大连市文化局局长、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195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6年到中国作协沈阳分会从事创作,后任分会主席。1957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他抗战及解放战争时期诗歌的结集《战斗的乡村》,主要包括晋察冀时期写的短诗和长诗《柴堡》,亦收有到东北后写的短诗三首。1978年后继续写了不少诗作,1985年出版诗集《大海的心》。



方冰

方冰的诗不拘形式,注重内容,思想深邃,感情奔放,朴实无华,率直纯真。他的《歌唱二小放牛郎》至今仍广为传唱。他不愿久居城市,多在农村深入生活。“文革”结束后,他创作了几百首诗作,其中《规律说》在《诗刊》上发表后,在全国诗坛上引起很大反响。他除写诗外,还创作小说,并主编过《当代诗歌》月刊。

方冰于1997年去世,享年八十三岁。



代表作品

《柴堡》(长篇叙事诗)

该诗于1944年冬发表于延安《解放日报》,诗以抗战为背景,以山西平定柴堡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生产度荒、保卫秋收为线索,塑造了好区长郝正光这一党的干部的光辉形象。诗以真人真事为原型讴歌了他关心人民疾苦、领导人民生产自救的业绩,赞扬了他为人民英勇不屈流血牺牲的精神,郝正光的形象是干部的代表,具有典型意义。该诗较早出现在解放区诗坛,对于解放区长篇叙事诗的发展具有较大的推动作用。

《歌唱二小放牛郎》(歌词)

这是方冰有感于解放区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勇于对敌作战、不怕流血牺牲的“晋察冀精神”,依据在解放区流传的英雄放牛娃王二小勇斗悍敌、保卫干部老乡转移而壮烈牺牲的故事而创作的一首英雄赞歌。歌词创作出来之后,由劫夫谱曲,在解放区广为传唱,极大地鼓舞了解放区军民的革命斗志。王二小的英雄精神,就是晋察冀人民为国家、民族不怕流血牺牲的英雄精神。



自述与文论

方冰(自传)^①

方冰

我是安徽省凤台县人,1914年生。父亲是个小店员,在我十二岁的时候,他就死去了。我是老大,下边还有两个弟弟,寡母带着我们过生活,比较清苦。

^①中国作家协会辽宁分会《千山文库》编辑委员会:《辽宁作家小传》,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7页。

十六七岁的时候,我就参加了地下革命活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1938年春到延安学习;冬,被分配到华北敌后晋察冀边区,打了六年多游击战争。开始时写街头诗,写歌词,借以动员群众,打击敌人,流传至今的《歌唱二小放牛郎》这支歌,就是那个时候写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来到东北,在当时的旅大直辖市及辽宁省,做了十多年文化行政工作,后来又回到文学创作队伍中来,担任过中国作家协会辽宁分会的副主席和执行主席。主编过《鸭绿江》文学月刊和《当代诗歌》月刊。

作品有《街头诗集》(在敌后出的,已经找不到了)、诗集《战斗的乡村》《飞》及长篇叙事诗《柴堡》,还写了十多篇短篇小说及一个剧本(是同别人合作写的)。

清除“四人帮”以后,创作热情高涨,写了很多诗,把其中的一部分结集起来,成为《大海的心》。1985年夏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到西柏林去参加西德主办的地平线艺术节会议,并将《大海的心》带到西德去。西德已经翻译了这本诗集,不久就要出版,我为德译本写了序言。

现在我的手里还有三本诗集——《西出阳关》《静静的海洋》及《方冰诗选》等待出版。长诗《寻梦记》完成初稿。

我是怎样和劫夫同志合作写《歌唱二小放牛郎》的^①(节选)

方 冰

二

1940年的晋察冀边区的“扫荡”与反“扫荡”,进行得非常残酷,而且时间长久,从春天一直到初冬。敌酋冈村宁次,动用了三十多万大军,亲自指挥,对晋察冀边区,用“三光”政策、拉网战术、梳篦战术等各种残酷的手段,烧光、抢光、杀光,真是惨绝人寰。我们遭受的损失很大,可是取得的胜利也很大。敌人的伤亡也很惨重,终究被我们军民坚如钢铁般的合作,打出边区去了,打掉了他们的锐气。这次反“扫荡”,我是被派到当时北岳区四分区的平定县,劫夫同志被派到三分区的完县(今顺平县)去打游击的,和老百姓一起坚持那个地区的战斗,与土地共存亡。

其中亲身经历过的,耳边听到左右发生的各种英雄人物的故事就很多了。那时习以为常,激动一下,流几滴泪或是连泪也没有,就过去了,因为天天要同鬼子周旋,得打仗啊!

反“扫荡”结束后,我们都先后到原先的驻地——平山县两界峰村。两界峰村位于郭苏河(滹沱河的一条支流)的上游、平山县北部与灵寿县交界处的大山口上,山里的一条交通要道经过这里,有近百户人家,在山里也可以说是一个较大的村子了。

^①中国少年儿童报刊工作者协会:《当代中国少年儿童报刊百卷文库·文学少年卷》,北京:同心出版社,1997年版,第12—16页。

回来一看，全村的房子几乎被烧光了，人被杀死很多。我们房东的俩弟兄和他们的老父亲都被敌人杀死了，只剩下两个妇女带着几个孩子，非常凄惨。我们同老乡一起修理好了房子，也不过就是能够避避风、躲躲雨雪，有个睡觉的地方而已。

一天，我同劫夫坐在台阶上晒太阳，谈到在反“扫荡”中各自见闻的那些英雄人物的故事，还在深深的感动之中。劫夫说：“我们写些英雄的故事歌，宣传宣传这些英雄人物，要广大人民群众纪念、学习他们不好吗？还可以传之后世，教育子孙，光荣光荣穷山沟里这些伟大的人民！”

正合我意！我也是这么想的。

那时非常困难，文房四宝不但谈不上了，连像样的纸张都找不到。我于是回到屋里，翻出点破纸头来，把钢笔尖插在高粱秸上，蘸着红药水，最多两个钟头，我就写出两首歌词来。《歌唱二小放牛郎》是先写出来的，立即交给劫夫去谱曲。他谱着曲，我又写出第二首词《王禾小唱》。王禾是个侦察员，来往于敌占区，敌人闻风丧胆。被捕后，他站立在祖国的大地上，一字不吐，英勇就义。

两个歌子，我俩不过用了不到半天的时间，就写好了。午后还教给村里的儿童团去唱，一唱就很快传开。《歌唱二小放牛郎》的曲子要好一些，所以流传得更快更广，不久就被《晋察冀日报》登出来，全边区都唱开了。很快又传到别的根据地去，甚至连敌占区的人民，也避着敌人偷偷地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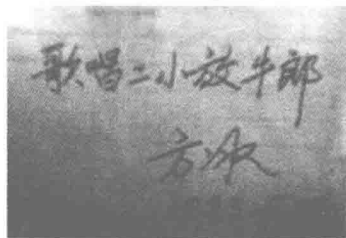
这不是谁主观地推广的，而是人民自发地唱开的，自动地流传开来的。

.....

五

我写这首歌词，也是预先有些想法的：

歌词一共是七段，每段四句。第一段和第七段，我用抒情的手法来写，以期引起作曲者的感情，中间五段，用极为简洁的手法，叙述事情的经过，而且有些地方用了极为夸张的手法，如“他的血染红了蓝天”的“染红了”。也采用拟人的手法，如“秋风走遍了每个村庄”的“走”字。流传转唱，差不多改动了的都是这些地方，其他地方也有。我希望都能够改正过来！有个统一的唱词，那就是原来我写的唱词。



方冰手迹

原歌最后两句是：“每一个村庄都含着眼泪，歌唱二小放牛郎！”有人说“眼泪”是消极的，把它改成了“微笑”，成为“每一个村都含着微笑，歌唱二小放牛郎！”了。

我认为这不仅是文艺上的教条主义，而且是一个美学上的问题——违反真实性，于是写了篇短文反驳，主要的意思是：人都死了，怎么能够笑得起来呢？如果真的都含着微笑，那对王二小的牺牲是什么情感呢？眼泪不一定是

消极的，要看什么样的眼泪。

贯彻工农兵方向 认真向民歌学习^①

方冰

总的说起来,新诗的名誉是不怎么好的,群众不喜欢它,说得苛刻一些,只是几个知识分子写给知识分子看,群众不买账,不承认作者是自己的诗人。

我这么说,是不是一笔抹杀了几十年来新诗运动的成绩呢?不是的。“五四”文学革命以来,新诗运动是获得了不小的成绩的,是中国诗歌一次巨大的革命。有成功的诗人,也有成功的诗作,在中国的诗歌发展史上应该写上光彩的一页。但是如果从中国六亿人口中的绝大多数——工、农、兵的角度上要求起来,新诗就显得非常可怜了。

这“可怜”是有它的原因的,有内容问题,有形式问题,有语言问题,有普及与提高的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但总的说起来是立场问题,是为谁服务的问题,就是写给谁看的问题。

按作者划分,诗歌有两种:一种是文人写的“创作”,一种是老百姓写的“民歌”。前者写在纸上;后者流传在口头上,经过文人的搜集,才有一部分写在纸上。老百姓的诗歌——民歌,不依靠文字的帮助,而能几百年几千年地流传下来,如果不道出人民的感情,不具备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当然是绝对不可能的,仅仅从这点上,也就可以看到民歌的价值。文人们的作品却不如此:他们用文绉绉的、不易为广大人民群众理解的文字写,使自己旧诗逐渐脱离了广大群众。

几千年来中国的诗坛,就一直是被文人们所独占;编写中国诗的历史,主要的也是文人诗的历史。人民群众的伟大创作——民歌,好像一股巨大的潜流,在地下流动着,虽然有时候也流出地面来,左右文人们的一代诗风,但主要的是在地下流动着。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反映在文学艺术上,就是“五四”文学革命,把僵尸似的文言文打垮了,代之以新鲜活泼的白话文。格律谨严、语言艰涩的旧诗,已经抒发不了新时代的感情,必须要突破旧诗的限制,寻找一种新的形式。自从“鸦片战争”以后,西洋的事物像潮水似的涌进中国来,西洋的诗歌当然也就跟着进来了。西洋诗歌的束缚比较少一些,形式比较自由一些。尤其是西洋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诗歌,奔腾澎湃,一进入中国,就马上放出它的光彩,震动了中国诗坛。我们的新诗歌接受西洋诗歌的影响,原是极自然的,吸收它的这些长处,加以消化,来营养自己,这不仅是可以的,而且是应该的,必要的。各个民族国家的文学艺术,都是互相交流,互相影响的。至于新诗歌的创造,主要的要继承中国诗歌的优良传统,在中国民歌、在中国古典诗歌的土壤里,尤其是中国新民歌的土壤里发芽生长。历史上每一次诗风的演变,新诗歌的产生,都是如此。

^①原载于《处女地》,1958年7月号;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民歌与诗风》,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第45—50页。

而从事新诗歌运动的人,差不多都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他们同工、农、兵的距离相当远,没有明确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人民群众的创作,当然不会引起他们的重视了。这就堵塞了新诗歌的主要的源流。至于他们对于古典诗歌的态度则是简单的抛弃,而不是以正确的批判的态度相对待。在那种摧枯拉朽的狂飙时代里,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也是很大的缺点。于是剩下来的只有向外国诗歌学习了,这种学习干脆地说就是模仿。洋腔洋调于是就充满了中国的新诗坛,刚才脱去老八股的束缚,马上戴上洋八股的枷锁,变成“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广大工、农、兵群众看起来不顺眼,听起来不入耳。于是只能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的狭小的圈子里转。过去,晋察冀边区,还有人说什么中国古典诗歌,没有什么好继承的,主要的是向外国诗学习;并且还曾出现“化大众”的谬论。由此可见,在知识分子中间,洋教条的流毒,实在是很深的。

我这么说并不是说整个诗坛都是如此,毫无例外,向民歌和古典诗歌学习的人是有的,但是不多。由于不向民歌和古典诗歌学习,新诗必然先天不足不能健康地生长,因此经历三十多年,还不成型,还没有在人民群众中扎下根去。

这难道只是技术上的问题吗?不是的,它的根源是立场问题,就是为谁服务的问题,绝大部分的新诗根本就不是写给工、农、兵群众看的。在中国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已经组织起来,为民族解放,为社会主义进行如火如荼的斗争的时代,而新诗不但不向他学习,反而要“化”他们,这怎么能行得通呢?当然它是不会有好运道的。

各个民族有各个民族的特点,各种语言有各种语言的特点,在这些特点上产生自己民族文学艺术独具的风格和形式。当然这种独具的风格和形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且也必然接受别的国家、民族文学艺术的影响。但影响只是意味着吸收、消化,变成自己的东西、丰富自己,不是取消自己民族特点去硬学洋腔洋调。但是,如果变化到民族的传统以外去了,像现在很大一部分新诗那样,广大人民群众一定是批不准的、不承认的,只有再变回来。

立场不仅决定一个人的观点,也决定一个人的爱好和口味。只有倾心为工农兵服务,才能倾心向他们学习,写出他们喜爱的东西,这个道理难道还有人不知道吗?民歌是人民群众的伟大创作,诗人们应该很好地向民歌学习,可是立场不变,或是没有很好地改变,知道是一回事,做起来又是一回事。“太阳一出满天红”难道不是一句好诗吗?你看它多么纯朴、多么有气魄,而且谁都能够懂得。可是唱惯了洋腔的诗人,却不一定喜欢它、欣赏它,要叫他们去写日出,或许会做出很多的比喻,加上很多形容词,一句话拖长到好几十个字,读起来就不大像中国人写的诗了,怎么能和广大群众结合呢?脱离了广大群众,自己还要硬干下去,至多不过是孤芳自赏而已。

要想使新诗为广大工、农、兵群众所喜爱,对于他们的生产斗争起到应有的鼓舞作用,必须要丢掉洋腔,把脚跟站在中国大地上,置身于广大工、农、兵群众中间,同他们共同战斗,共同劳动,共同去歌唱,共同去幻想,虚心地向他们学习才行。像周扬同志所说

的：“诗人只有向群众学习，向民歌、特别是向新民歌学习，才能为我们的诗歌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对于我国的古典诗歌，也要继承它们的优良传统。割断传统是不能有正常的发展的。我们反对洋腔，也并不是排斥外国诗歌。对于外国诗歌，我们还是要学习的、要借鉴的，但是要吸收它们的长处，消化了，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

不久以前还有人忧虑：大家都向民歌学习，写民歌体的诗，怕会降低诗歌的质量。这种忧虑其实质是不承认民歌的优越性，不愿意向民歌学习，对于洋腔洋调还是恋恋不舍。坚决地向民歌学习吧！起初是会写出一些不怎么高明的东西来的，久而久之定会打开一个新的局面，产生伟大作品的。我国伟大的诗人屈原、李白、杜甫等，都是认真地向民歌学习了的。许多伟大的外国诗人，也是这样。难道那些充满了洋腔洋调的诗歌，它的质量就是高的吗？我看还赶不上一首普通的民歌体的诗，后者老百姓还可以看得懂、听得懂，还可以对他们起到应有的鼓舞作用。

所以问题的关键，还是在认真改变自己的立场，改变自己的观点和兴趣，要真正做到这点，那就需要认真地到群众中去锻炼，到劳动中去锻炼，彻底把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尾巴割掉，才能有坚决地明确地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才能虚心地认真地向丰富多彩的民歌学习，才能建立自己新的诗风。

1958年6月15日夜



忆述评论

晋察冀诗人方冰诗略论^①(节选)

李迎春

以写《歌唱二小放牛郎》名世的方冰，是晋察冀诗人群中具有独特个性的一个。他的诗多抒写抗战时期人民的苦难和反抗，既歌颂了人民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和品格，也控诉了日帝的侵略暴行。巍巍称赞“方冰的诗，感情丰富，色彩鲜明，在诗歌艺术上，他是一个线条明朗、色彩引人的画家”（《晋察冀诗抄·序》）。

一、歌赞“晋察冀的精神”

方冰生活战斗在非常残酷的抗日战争年代，亲眼看到晋察冀人民顽强的战斗，感受到英勇牺牲的精神和不屈的民族气概，这些化而为诗，当然会形成战斗的冲力。方冰在诗里反复歌吟的“晋察冀的精神”，正是中华民族决不屈服，乐观进取精神的体现。

首先，“晋察冀的精神”表现在复仇的情绪里。他在《我亲眼看见的》这首诗里，摄下了日寇惨无人道地烧死一个小小的孩子的镜头，并怒不可遏地呼喊：“我们要复仇！”“山

^①原载于《安徽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4期。

上的岩石啊/你们一齐爆炸吧/一齐爆炸吧/炸死那些绝灭人性的牲畜!”在《炸死那些野兽们》一诗里,诗人为亲人复仇,为被残害的家乡复仇的怒火燃烧,他呼喊着:“多埋一些地雷/炸死那些野兽们!”“叫他们/走在路上路上响/进了村子村里响/推门门响/上炕炕响/打水桶响/烧火灶响/山上也响河里也响;”“就这样也炸不平/这太多的仇恨!”读着这样的诗句,你能不感受到一种愤怒的燃烧,你能不感染着一种仇恨的汹涌。这种复仇的精神,正是“晋察冀的精神”!

其次,在方冰的诗里,“晋察冀的精神”更突出地表现为为保卫家乡的土地及亲人而勇于献身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为讴歌这种精神,他在《歌唱二小放牛郎》里为放牛的王二小献了一支颂歌。这位普普通通的放牛郎,这位在晋察冀随处可见的放牛娃,这位连大名都不为人所知的王二小,却有着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为保护干部和老乡的安全,为保护后方机关的安全,“把敌人引进我们的埋伏圈”,以个人的牺牲“掩护千名老乡”。“敌人把二小挑起在枪尖/摔死在大石头的旁边上面/我们的十三岁的王二小/可怜他死得这样惨/干部和老乡得到了安全/他却睡在冰冷的山间/他的脸上含着微笑/他的血染红了蓝的天。”王二小的这种精神,代表了晋察冀人民为国家、民族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这首曾在晋察冀广为人民传唱的歌,不久即传遍所有的解放区,新中国成立后曾在全国各地流传,至今不衰,可见它所代表的精神多么为人所敬佩。

再次,方冰诗里的“晋察冀的精神”又是一种不屈的、必胜的信心的体现,是一种充满乐观的精神。这在那样严酷的斗争的战争年代,是一种至为可贵的精神,一种强大的战胜敌人的精神力量。正是因为有这种精神,才终于将凶残的野兽降服,取得抗战的伟大胜利。

.....

歌声是庄严的宣告:晋察冀永生,晋察冀的人民是杀不尽斩不绝的,是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牧羊人赶着雪白的羊群,唱着动人的歌的画面,是一个动的强有力的生命力的揭示,也是“天空不见飞鸟/路上没有行人”静的画面的映照,动的精神的昂扬,歌声的荡漾,羊群的涌动,是生命力的象征,是“晋察冀的精神”的宣示,也是中华民族精神顽强存在的表现。

正因为有不屈的、乐观的“晋察冀的精神”,战友的血滴才“像一朵不灭的火焰/它给我以战斗的力”(《血滴》)。1943年秋季扫荡,日寇荒井大队,要把平阳造成无人区,杀死我一千多个老乡,水井地窖都填满了,惨不忍睹。虽经过空前残酷的杀戮,春天依然蓬勃昂扬,布谷鸟在欢歌,河水在流淌,麦苗在生长,豌豆在开花,平阳活跃的生命,正是晋察冀以至整个中国生命力的象征。在《过平阳镇》一诗中描绘了惨剧之后平阳镇的春天,象征性地歌颂“晋察冀的精神”。

方冰诗里揭示的复仇的情绪,英勇献身的精神,顽强乐观的不屈性格,构成了“晋察冀的精神”的整体,这正是诗人诗歌的灵魂。诗人的品格和精神也都融入这个整体,它所化成的力量将是巨大无比的。特别应提及的是方冰的《柴堡》。1944年冬,方冰到延安

进中央党校学习,他把1943年冬写于平西的长篇叙事诗《柴堡》进行加工修改,使这一鸿篇巨制在延安《解放日报》与读者见面,对长叙事诗在解放区的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诗以抗战为背景,以山西平定柴堡人民在党领导下生产度荒、保卫秋收为线索,塑造了好区长郝正光这一党的干部的光辉形象。诗以真人真事为原型讴歌了他关心人民疾苦,领导人民生产自救的业绩,赞扬了他为人民英勇不屈流血牺牲的精神,郝正光的形象是干部的代表,具有典型意义。诗以不少篇幅,写葬礼及人民的哀思,正表现郝区长与人民的关系何等密切,群众对他多么爱戴。

二、明丽的色彩和感兴式的抒情

著名诗人艾青曾指出:“一首诗里面,没有新鲜,没有色调,没有光彩,没有形象,——艺术的生命在哪里呢。”(《诗论》)色彩是使诗歌形象化的重要手段之一。方冰的诗,十分注重用明丽的色彩去表现晋察冀人民的生活和战斗,去讴歌祖国的美好,并以此形成其诗歌的艺术个性。

《柴堡》开头写秋收季节庄稼快要熟了,一块块像黄金,“衬着青的天/衬着红的树/衬着紫的山”。一幅多么明丽的秋野图啊,以黄金似的成熟的庄稼做底色,又以青色的天相映照,以红树紫山来点缀,祖国的山野美极了。这样写一方面讴歌山河的美,另一方面也是衬托和表现主题,这样的好收成,是郝区长领导柴堡人民从斗争中得来的。

诗人对红色更是着意渲染。他从战士一颗“鲜红的血滴”,看到“那么明亮的燃烧/像一朵不灭的火焰/它给我以战斗的力”(《血滴》)。在《过平阳镇》的开头,诗人就用富有哲理性的诗句去引人思考:

据说,
仇恨的血迹,
是很难消灭的;
它永远鲜红,
在复仇者的心里。

把日寇屠杀中国人民的鲜血的红色,注入读者的心里,使你不能平静,要复仇,要杀死鬼子。《红灯》诗里,在敌占区,在封锁墙的跟前,“出现一盏红灯”,每天晚上“频频地闪耀着/那么期望!那么热切/像有无限的话语/向解放区倾吐”。接着交代灯的来历。结尾用“像一颗滴血的心”联想比喻,既形象鲜明,又发人深思,时时闪耀在读者心底。《拿火的人》用点起的草绳,引送夜行的人们,一村又一村。诗以红色形象地揭示出一幅画、一个场景,给人的印象是深刻的。

方冰诗的另一个重要特色,是常用感兴式的抒发来抒情。诗人生活在残酷的战争年代,生活在战斗的抗日根据地,所见所闻引起所感,所以他的诗善于用白描勾勒场景,并

寄寓着感情。像《马》，仅用六句，就把“我”战前的渴战心情写出来了：

马在棚里暴叫，
我披上衣服点起灯，
走到马棚里去。
——咏！忍耐些，
我的战斗的伙伴，
出击令就要下来了！

也有一些诗，感兴的句子是直接表达的。如《血滴》，“给我以战斗的力”是感兴的直接抒写；《歌声》，感受到的“晋察冀的精神”也是赤裸裸地表达，至于“我把诗句写在断墙上/好像烈火烧着我的心”（《写在断墙上》）也是感情的直抒。

《我亲眼看见的》《炸死那些野兽们》，从题目到内容都是难以抑制的激烈情感的迸发，充溢诗篇的愤怒和仇恨，燃烧的情感，烧灼诗人的心胸，这些当然是直抒胸臆之作了。

这里只就方冰诗歌艺术的两个方面予以探讨，除色彩美及感兴式抒情之外，方冰诗的艺术追求是多方面的。他用多种样式写诗，特别注意形式上的创新，像《歌唱二小放牛郎》既有民歌的影响而又非单纯模仿，表现出他对群众喜闻乐见形式的创造，探索是艰苦的，也是有成效的。

走向客观抒情深化的历程^①（节选）

——论方冰诗歌抒情方式的发展方向

李万庆

方冰的名字是和晋察冀诗人群连在一起的。在漫长的抗战年代里，他给我们留下了著名的诗作《歌唱二小放牛郎》《拿火的人》《歌声》《三月的夜》等。新中国成立后，他从未间断过写诗，但是过多的行政工作，影响了他的诗情，诗人的声音减弱了。经过十年炼狱生活的洗礼，诗人从严寒的冬日翘望春天，在“四人帮”覆灭前夕，重新试炼诗的锋芒。接着，在春回大地、举国欢庆的日子里，在思想解放洪流的推动下，迎来了他诗歌创作历程中第二个高峰时期。新时期以来，方冰一些新作，如《规律说》《大海的心》等，受到了好评。

方冰最近出版了新时期创作的第一本诗选集《大海的心》，这虽然是他大量新作的一小部分，但是从中我们也能看出这位老诗人新的创作实绩；而他写于抗战时期的诗，除了遗失的以外，主要收入《战斗的乡村》诗集中。

^①李万庆：《新诗的艺术》，沈阳：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57—60页。

艺术不应该成为政治思想的传声筒,那么对一位诗人的要求必然是其思想独创性和艺术独创性的有机融合。我们只有从方冰抒情方式的演变中,才能考察其综合的思想意蕴和战士的气质。那么衔接方冰在抗战时期和新时期诗歌创作上的两个高峰的抒情纽带的变化是什么呢?我们认为这就是他从抗战时期的客观抒情,或叫叙事中的抒情到新时期之初的主观抒情或者可以说是直抒胸臆,再到近几年又回复到一种新的客观抒情风格,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寓意化的客观抒情。这种诗在叙事性的故事框架下面,安放了那么多暗示的触角,让联想带读者发出对历史的深沉反思。所以,方冰的抒情方式螺旋式上升的轨(原文为“规”,编者注)迹是:客观抒情——主观抒情——客观抒情的深化。

当年在晋察冀解放区,出现了以田间等为代表的小叙事诗派,即晋察冀诗人群。他们为了战斗的需要,创造了街头诗、墙头诗和许多具有简练人物勾勒、简要情节的小叙事诗,他们这种把客观叙事与主观抒情相结合的诗风,在新诗发展史上具有独特的美学意义,已经引起了有关文学评论家的重视。在抒情中融入叙事和描写,或者通过叙事达到抒情,都是一种抒情的客观化倾向,或者也可以叫作客观抒情诗的创作。方冰在晋察冀这种倾向于叙事和描写的抒情流派中,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位。他的诗思很活跃,他既写了一些很优秀的主观抒情诗,即他让抒情主人公直接抒怀,《歌声》《我的生命》《延安》是其代表;他又创作了不少客观抒情诗,即以客观叙事、描写为特征,如《拿火的人》《歌唱二小放牛郎》《三月的夜》等;相比之下,后者比前者更能代表方冰的风格和个性。方冰是一个侧重于客观(原文无“观”字,编者补)抒情的诗人,同那些侧重于主观抒情的诗人相比,他对同一个题材的处理上,则往往取描绘和叙事的方式,形成一种可以触摸的真实情境。如果说客观抒情诗偏于造型性想象,而主观抒情诗偏于流散性想象,那么方冰善于造型设计。像发表在《七月》上的一首《胜利的消息》,这首诗用主观抒情,也许更能直接传达胜利的喜悦,而方冰却用一个客观视角摄取那激动人心的一瞬:“紧张的街头上/老乡们/兴奋地走过,抓住人就问/‘知道吗/昨夜大龙华/敌人/被打死四百几!’”激情被藏在情境背后,有力地传达出群众高昂的情绪。在倾向于客观化抒情的诗作中,方冰的表现手法是丰富多样的。这里既有像《歌唱二小放牛郎》那样对抗日小英雄传奇性故事的单纯叙事,又有像孙犁的《荷花淀》般淳美,充满了戏剧情致的《三月的夜》。但是有一首诗也许更能连起方冰通向未来的路,那就是《拿火的人》。作为诗人兼作家的魏巍的眼光是敏锐的,他在《晋察冀诗抄》中,把这首诗放在方冰诗作选的第一首,并在该书序言中对方冰的诗做了这样的评价:“方冰的诗,感情丰富,色彩鲜明,在诗歌艺术上,他是一个线条明朗、色彩引人的画家。”这正是对方冰那种客观逼真描绘特色的高度概括。《拿火的人》就是一幅具有明朗线条、鲜明色彩的流动画卷。诗中秋冬夜晚那些拿着艾火,把我们的子弟兵引送前行的乡亲们,不仅成为全诗外在情节的贯穿线,而且被描写得传神入化。在黑漆漆的夜里,山路“隐在地皮里,像胖子身上的血管”。山谷卷起的风,阴森得像饥饿的狼群,使人打寒战。怎样才能冲出黑暗和险恶性环境的包围,找到正路,这正是读者急于寻求的答案。突然,在你的面前出现了手执艾火的引路人。他对这山

路,同“自家院子一样清楚。你只需紧随着他,艾火的香气扑你一身”。这是多么令人放心而亲切的关系呵!接着,山路上又“闪出一朵火来”,那是一队驴子驮着沉重的小木箱;或是一支队伍,悄悄地行进。“那拿火的人,照例走在前边,火星子被风一吹,发出哗扑的响声。”一支支火光,在阴险的山中闪烁着。凶险中反衬出安全;黑暗里辉耀着光明。我们看到,你被拿火的人互相接送着,一村又一村,一站又一站,走向了既定的目的地。“方冰在诗篇里,不仅使我们看见火绳哗剥的火星,闻见艾火的香气,而且使你感到这不是一个人在活动,这是一个庞大的、有严格组织的人群在活动。仿佛使你看到,在晋察冀的山野,在晋察冀的夜里,有无数拿火的人在你前面行进。”(魏巍《晋察冀诗抄·序》)方冰在这种真切的描绘里,透出一股对晋察冀母亲般的情怀。这首诗没有主观抒情,全凭客观描摹,为什么会使人产生仿佛“有无数拿火的人在你前面行进”的超越画面本身的联想?这联想来自诗本身的那种写实的象征力量。由于诗人经过长期的观察和体验,从整体上抓住了晋察冀不屈精神的实质,就使诗人在具体的描述中渗透了这种精神。这样,越是有选择地画出生活本身的真实情境,就越能收到“实景清而空景现”的象征效果。透过这幅画面的表层,一股强大的暗示力量,跃然腾起。同样,《歌唱二小放牛郎》也许更具故事的叙事性,流传更广泛。但是,显然,这两首同样着眼于在描述中抒情的作品,在源流和艺术表现上是不同的。前者带有“五四”新诗那种融主观于客观的抒情性,后者带有民歌传统的叙事性;前者重暗示,后者重歌唱。由于频繁艰苦的战争还来不及使诗人以自觉的高度沿着《拿火的人》这样写实性象征的诗路发展,而真切的叙事与描写更能适应那种迅速地反映生活的战争环境,所以,类似于《歌唱二小放牛郎》这样直观式的抒情在方冰和晋察冀其他诗人们的创作当中已经形成一种较为普遍的叙事抒情的范式。这类诗易于直观地去把握,而不耐咀嚼,以其内涵的明朗、单纯便于文化水平较低的农民所接受。

创作及文学活动年表

1938年冬,到晋察冀边区做宣传工作,开始他的以诗歌为主的文艺创作活动。他的诗歌理论批评文章和由他作词的《誓死不投降》《子弟兵进行曲》,获得边区军民誓约运动征文奖和鲁迅文艺奖金。

1939年4月,方冰由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奉调至西北战地服务团,曾任西北战地服务团文学队队长。这期间,与田间、邵子南、曼晴、魏巍等积极开展“街头诗运动”,主编油印诗刊《诗建设》。

1941年秋,创作《歌唱二小放牛郎》,由劫夫谱曲。

1945年春,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反映敌后艰苦斗争生活的长篇叙事诗《柴堡》。

同年,抗战胜利后,方冰到东北解放区,任新民县委宣传部部长。后调至旅大市任市文化局长兼文联主席,负责文艺创作的领导工作。

1947年,出版《柴堡》(长篇叙事诗)单行本,由大连光华书店出版。

195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1955年,纪念反法西斯战争十周年活动中,荣获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的抗日战争老作家荣誉奖。

1956年,到中国作协沈阳分会从事创作,后任分会主席、大连市文化局局长、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

1957年,出版诗集《战斗的乡村》,由北京作家出版社出版。主要包括晋察冀时期写的短诗和长诗《柴堡》,亦收有到东北后写的短诗三首。

1962年,出版诗集《飞》,由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1979年1月,重版诗集《战斗的乡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收入部分新诗。同年,主编《建国三十周年辽宁省文艺创作选·诗歌选》由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序文《建设人民大众的诗歌队伍》。

1985年夏,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到西柏林去参加西德主办的地平线艺术节会议,诗集《大海的心》在西德翻译出版,并作德译本序言。同年,出版有诗集《大海的心》,由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创刊诗歌月刊《当代诗歌》,任主编。

“文革”结束后,他创作了几百首诗作,其中《规律说》在《诗刊》上发表后,在全国诗坛上引起很大反响。

主编过《鸭绿江》文学月刊。另有诗集《西出阳关》《静静的海洋》《方冰诗选》及长诗《寻梦记》等。

研究综述

目前学界对方冰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生平与创作概况介绍;二、艺术成就总体评价;三、具体作品的艺术分析与评价。下面分述之:

一、生平与创作概况介绍。这些主要体现在回忆和悼念文章中,如《悼念方冰小辑》、谢挺宇的《悼方冰诗二首》、于成全的《永远怀念方冰同志》、沙金成的《火一样的诗情 海一样的心——访老诗人方冰》、边玲玲的《放牛的却不知哪儿去了?——怀念诗人方冰》等,介绍方冰的生平经历和创作概况。

二、艺术成就总体评价。这些研究成果有王建中等的《东北解放区文学史》的“第五章 第二节 方冰、公木的诗歌创作”、李迎春的《晋察冀诗人方冰诗略论》、李良玉的《老树新花 赫然如火——评方冰近年的诗》、苏龙的《诗要情真——方冰同志诗琐议》、李万庆

的《走向客观抒情深化的历程——论方冰诗歌抒情方式的发展方向》和李万庆的《来自历史深层的诗(方冰)》等,对方冰的诗歌创作(从抗战时期或称晋察冀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后再到新时期)从艺术层面进行了整体性的考察和评价,对其诗歌的思想、艺术成就进行文学史层面的研究和定位。这些研究指出了方冰诗歌创作在艺术上的一些特色:如色彩是方冰使诗歌形象化的重要手段之一,方冰十分注重用明丽的色彩去表现晋察冀人民的生活和战斗;用感兴来抒发感情;情感上奔放与沉郁的结合;用多种样式写诗,特别注意形式上的创新,等等。

三、具体作品的考察和研究。这方面主要集中在对其传唱最广的《歌唱二小放牛郎》(方冰作词,劫夫谱曲)的产生和传播过程的考察、研究甚至是“王二小”的人物考证上,这些文章有新丁的《方冰和〈歌唱二小放牛郎〉》、郭仁怀的《血染的牧歌——析方冰〈歌唱二小放牛郎〉》、华东方的《方冰与“王二小”》、顾品祥的《〈歌唱二小放牛郎〉我独唱了半个世纪》和高振山的《“王二小”考》等。这些研究指出:《歌唱二小放牛郎》既受民歌因素的影响又非单纯模仿,表现出方冰对民间形式的借鉴与超越;同时,他们也追溯了方冰的革命文艺生涯,并对王二小这个家喻户晓的人物进行细致的考证。此外,如朱寨的《诗的散文美——读〈大海的心〉致方冰同志》、胥树人的《山和海的歌者——论诗人方冰》则讨论了方冰的诗集《大海的心》的艺术成就。

目前,还没有关于方冰及其作品的研究专著问世,学界对方冰在诗歌理论的研究几乎没有,这与方冰在新民歌、新诗发展方面所做出的贡献还远不相称。因此,对于方冰及其诗歌创作和理论探索的研究,还是一个值得探索的学术空间。

主要研究论著索引

一、专著、文集、史料

1.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 民歌与诗风. 北京市:作家出版社,1958.
2. 茅盾等. 给青年作者的信.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59.
3. 全国当代诗歌讨论会. 新诗的现状与展望.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1.
4. 沙金成. 文艺百星——新闻人物访问记. 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
5. 张松魁,李作祥. 当代东北作家论(第1辑).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9.
6. 姚家华. 朦胧诗论争集. 北京:学苑出版社,1989.
7. 李万庆. 新诗的艺术. 沈阳:辽沈书社,1993.
8. 郭仁怀. 血与火凝成的诗歌——赏析. 合肥:黄山书社,1994.
9. 朱寨. 感悟与沉思:一个当代文学研究者的手记.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10. 王建中等. 东北解放区文学史. 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5.

11. 中国少年儿童报刊工作者协会. 当代中国少年儿童报刊百卷文库:文学少年卷. 北京:同心出版社,1997.
12. 张志平. 非凡岁月 西柏坡——平山重大革命事件和人物史录.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8.

二、文章

1. 苏龙. 诗要情真——方冰同志诗琐议. 鸭绿江,1978,(8).
2. 李良玉. 老树新花 赫然如火——评方冰近年的诗. 当代作家评论,1984,(6).
3. 李万庆. 来自历史深层的诗(方冰). 文艺报,1985,(12).
4. 李迎春. 晋察冀诗人方冰诗略论. 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0,(4).
5. 顾品祥. 《歌唱二小放牛郎》我独唱了半个世纪. 新文化史料,1995,(4).
6. 于成全. 永远怀念方冰同志. 鸭绿江,1997,(9).
7. 谢挺宇. 悼方冰诗二首. 鸭绿江,1997,(9).
8. 边玲玲. 放牛的却不知哪儿去了? ——怀念诗人方冰. 当代作家评论,1998,(4).
9. 华东方. 方冰与“王二小”. 党史纵横,2005,(9).
10. 新丁. 方冰和《歌唱二小放牛郎》. 江淮文史,2009,(3).